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進修)

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進修
「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ates and Markets in
the 21st Century)」

服務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姓名職稱：湯士萱專員

派赴國家/地區：英國倫敦

出國期間：114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16 日

報告日期：114 年 10 月

摘要

本人承蒙長官肯定，獲得參與本會「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出國短期進修實施計畫」機會，得以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修習為期三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相關課程，課程首先介紹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理論如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馬克思主義，以不同重點分析國際經濟現象，包括市場機制與合作、國家權力與安全、經濟結構與階級；課程亦結合多項當前國際政經重大議題之實務與理論，探討全球化與反全球化、WTO 多邊談判僵局及區域貿易協定興起、國際金融與貨幣霸權、美元地位及金融危機、大國競爭、美中貿易衝突以及科技管制與全球失衡等議題。透過理論講授與國際案例研討交互進行，深化了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理解。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環境正處於重大轉折，各國經濟政策重心已從追求效率轉向兼顧安全與韌性，同時轉趨經濟民族主義並強化區域聯盟，特別是美中對抗、地緣緊張等導致全球供應鏈重組，並導致「友岸外包」等供應鏈政策出現，加以 WTO 等多邊機制日趨弱化，區域經貿協定與供應鏈區域化蓬勃發展。另新冠疫情暴露全球供應體系脆弱，各國祭出空前的財政與貨幣刺激政策挽救經濟，全球政經秩序正在適應這些變化並朝多元格局演進。美中貿易與科技戰引發供應鏈重組與貿易轉移，然而長期而言，美中脫鉤恐重創臺商過去在中國的產業佈局，加以臺灣未能加入主要的區貿易協定，後續恐有被區域經貿體系邊緣化之虞。因此，政府應強化國內供應鏈韌性與產業創新，積極培育高階科技人才，同時爭取加入 CPTPP 等高標準經貿協定，並深化與美、日、歐盟及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合作，以提升臺灣競爭力。

目次

壹、 目的.....	1
貳、 進修計畫與課程概述.....	2
參、 課程內容.....	4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簡介.....	4
二、全球經濟秩序的創建與演變.....	7
三、IMF 與世界銀行的組織運作、規範與影響.....	10
四、WTO、貿易戰與區域主義：國際貿易體系的主要挑戰.....	12
五、全球政治經濟中的跨國公司.....	15
六、中美競爭-新冷戰.....	16
七、金融危機與新興市場.....	20
八、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24
九、國際關鍵貨幣：美元、歐元與人民幣.....	27
十、歐盟、英國脫歐.....	30
十一、 COVID-19 與全球政治經濟.....	34
肆、 心得與建議.....	37
參考文獻.....	45

壹、目的

近年國際情勢變化快速、地緣衝突頻發、全球供應鏈分散/重組趨勢、科技出口管制、新冠疫情大流行等，推動全球化由過去的持續整合轉向風險控管與分散，在此情形下經濟發展不再被視為第一優先，主要國家紛紛將政策重點轉向安全、韌性及風險分散等，政府部門制訂經濟政策時需要將安全、效率與公平等議題同時納入考量，而非如過去一般僅強調效率最大化；因此，政府部門的經濟研究複雜度及難度大幅提高，往往須同時就制度、權力與市場間的關係一併分析。為因應前述挑戰，本次出國進修選擇赴倫敦政經學院修讀國際政治經濟學相關課程，希望藉由系統性學習相關理論、國際最新觀點及結合實際案例，強化對目前國際競爭態勢、供應鏈安全、跨國企業治理與多邊制度的背景知識與理解。

本次進修係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出國短期進修實施計畫」，核定派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參與 2025 年暑期課程 IR209「21 世紀的國際政治經濟：國家與市場」（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ates and Markets in the 21st Century），上述計畫旨在強化公務人員全球政經議題之專業知能與國際視野，配合國家發展施政需要增進業務相關知能，透過參與世界一流學府的相關課程，提升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理論素養與實務能力，以利深化政策分析能力、因應當前瞬息萬變的全球政經局勢。

倫敦政經學院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內容涵蓋主題廣泛，主要探討的議題緊跟當前國際政經情勢，內容涉及全球化與反全球化趨勢、國際組織與多邊制度、主要國際貨幣體系、多邊經貿合作、跨國企業角色的分析等，有助拓寬產業與發展相關知識，以及加深中美經濟相關議題探討的深度與廣度；另 COVID-19 疫情衝擊等全球性挑戰，均與當前政府政策前瞻布局相關研究呼應，因此希

望透過本次進修吸收最新的國際觀點，研究國際案例與成果，或將有助於後續以更宏觀、多元的視角進行相關研析，同時強化後續研究的前瞻性和周延性。

此外，IR209 課程著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與現實案例的結合，有助無相關背景的學員系統性地學習全球政治經濟重要議題與知識，包括國際體系中權力與利益的角力，以及市場運作背後的政經動態。期望藉由此次課程訓練，結合理論視角、課程案例與當前國際經濟情況，深化國家與市場間互動邏輯的理解，並將課程所學應用於日後政策分析工作中，提升職務中研究量能，以及完善研析觀點，擴大政策研擬的深度與廣度。

貳、進修計畫與課程概述

一、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簡介：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創立於 1895 年，為專注於社會科學領域的世界頂尖學府，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帝國學院、倫敦大學學院並列為英國「G5」超級菁英大學，亦為英國金三角名校及羅素大學集團成員，該校在全球大學排行榜中長期名列前茅，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享有崇高聲譽（例如 2020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44 名、社會科學領域歐洲第 1 等）。LSE 培育出許多對國際政經具有影響力的人才，依據學校官網統計資料¹，截至 2024 年其校友與教職員中共有 20 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文學獎 2 位、和平獎 3 位、經濟學獎 15 位，同時培育出逾 40 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世界級領袖，顯示該校在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方面的卓越貢獻。

二、 IR209「21 世紀的國際政治經濟：國家與市場」（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ates and Markets in the 21st Century）課程簡介

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學系是全球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國際關係學術單位之一，在 2025 年 QS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政治與國際關係領域）中名列全

¹ 檢自 LSE Nobel Prize winners <https://www.lse.ac.uk/about-lse/lse-people/lse-nobel-prize-winners> 及 LSE world leaders <https://www.lse.ac.uk/about-lse/lse-people/lse-world-leaders>

球第 5，本次進修的 IR209 課程聚焦 21 世紀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介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與理論框架，來剖析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所面臨的關鍵問題與政策挑戰。

IR209 課程涵蓋的主題廣泛多元，包括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浪潮、國際組織與多邊制度的運作、跨國企業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主要國際貨幣的霸權地位（如美元體系）與其對國際金融穩定的影響、歷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成因與因應，以及大國（尤其中美）戰略競爭、COVID-19 疫情衝擊等當代全球治理挑戰。課程設計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透過對以上議題的案例分析與討論，培養學員國際觀、批判性思維，深化對市場與國家權力交錯影響的理解，進而提升學員對相關政策議題進行分析研判與提出論證的能力。

三、 課程設計方式

本次赴英國進修期程自 2025 年 6 月 22 日起至 7 月 13 日止，共計三週，其間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均安排課程講授與討論，以每日密集上課方式進行，教學形式結合教授大班講授，以及助教小班研討，課程至少 54 小時，包括 36 小時的講座授課以及 18 小時的小班討論，每堂課程內容除了主要教科書章節內容，更涵蓋許多補充閱讀論文以及書籍，除了上課時間，每日約需投入 2~3 小時進行小組討論資料預備及自習閱讀，以充分理解課程內容。

IR209 課程由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親自授課，採取案例研析的教學模式，提供理論背景，講座授課結束後，由助教帶領學員就課程內容直接進行課間問答、小組討論、分組辯論、議題探討、專題報告等，扎實地帶領學員對課程理解及洞見。透過嚴謹的考核機制，確保學員精準掌握國際政治經濟理論要旨，並具備將所學應用於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進修期間本人全程參與課堂講座學習，並利用課餘時間進行指定閱讀與準備課後作業，為本次短期出國進修畫下圓滿句點。

叁、課程內容

本次赴 LSE 進修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中探討的主要重點，就課程主要重點內容，彙整如下：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簡介

(一)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視角**：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聚焦國際政治與經濟的交互作用，在觀察全球經濟議題時，理論視角(或稱意識形態)包括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簡介如下：

1. **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承認國家作用，但強調一國內的個人、消費者、企業、社會團體等個體在塑造政策時的作用，並且對國際經濟合作持樂觀態度，強調經濟自由化與市場效率，認為透過互惠貿易和國際機構的規則可以使絕對收益增加，而自由貿易可使參與的各方皆享受到繁榮，因此政府僅應扮演有限角色維持市場運作。
2. **現實主義**：將國家視為核心行為者，假設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缺乏至高權威）而充滿不確定性，國家著重關注權力分配和相對收益，因此現實主義將國際經濟競爭視為零和遊戲，強調國家權力和安全利益，主張國家應利用貿易政策(如保護主義)強化自身相對實力，認為強權霸主可提供穩定國際經濟秩序的公共財。
3. **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將經濟階級視為主要行為者，認為國際經濟關係受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剝削與依賴所驅動，主張實施資本主義將讓資本階級壟斷財富，並且壓迫勞動階級，因此特別強調經濟結構中的階級剝削與不平等，認為階級(而非個人)是全球經濟中的主要行為者，同時著重在全球南方與傳統西方世界的差距、依附關係等結構性問題。

(二)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工具

1. **結構層**：描述國際體系的外部環境與權力版圖，如是否存在霸權、體

系是否分裂，決定合作的可能性與成本解釋全球經濟秩序的形成與合作維持方式：

- (1) **霸權穩定理論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主張由單一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財是國際經濟體系穩定開放的關鍵，例如 19 世紀由英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或是二戰後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框架等，由一個具備壓倒性實力的國家提供貨幣體系、開放市場及扮演最後貸款人角色等國際公共財，以此維繫全球經濟繁榮。理論基礎為霸權國願意承擔提供公共財的成本係為了長遠利益，並可減少了各國合作的執行與協調難題；然而當霸權國的實力下降時，國際體系可能發生失序、合作體制面臨瓦解等情況。
- (2) **國際制度理論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認為國際制度和規範能克服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困境，透過包括世界貿易組織 WTO、國際貨幣基金 IMF 等國際組織和各類協定，設定共同標準、建置談判平台等，可降低資訊不對稱與交易成本。因此主張國家間可透過國際制度實現合作，降低互信障礙，並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推動合作，最終達到由制度化合作來支撐國際經濟秩序的目的，而不需要依賴單一霸權。
2. **制度層**：決定利益如何被表達與利益折衝分析，例如 WTO 等國際制度制定監督與爭端解決等規範，將國家間互動規則化，同時關注不同國內經濟群體在國際經濟政策中的得失，用以解釋貿易政策下國內誰受益、誰受損的問題。然而制度本身的侷限如資訊不對稱與執行問題等，可能導致制度效果打折扣，權力不對等則可能使制度規則被大國或利益團體所操弄或迴避。
 - (1) **國際制度與合作**：國際制度透過建立監督機制、制定共同標準、綁手式承諾與爭端解決機制，降低國際合作的不確定性與談判成本，

從而促進國際間合作。例如國際協定要求成員定期披露經濟政策、通報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等，以降低資訊不對稱和互相猜忌，或如 WTO 建立正式的糾紛解決程序，會員國在貿易糾紛時可以通過仲裁而非單邊報復，進而維持合作秩序，增加資訊透明度，加強信任機制，並為各國提供平臺協調政策與解決分歧。然而在霸權國家衰退與地緣經濟碎片化之情境下，傳統多邊機制已逐漸被更具排他性的區域或雙邊安排取代。

- (2) **國內制度與政策：**國內制度方面，不同的選舉制度可以塑造政黨數目及其競爭策略，例如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FPTP）往往導致兩黨競爭，政黨為了取得勝選而向中間選民靠攏，最終政策偏好趨中性化，相對的比例代表制與多黨制常促成聯合政府，要求各方對政策進行妥協；另而立法與行政制衡的多重決策程序在增加政策形成的複雜性的同時，也增加了約束力。因此，制度差異會影響各國政府在貿易與經濟政策上的偏好整合程度。
3. **偏好與分配層：**聚焦國內利益團體是否因貿易、金融開放等政策而獲利或受損。
 - (1) **Heckscher-Ohlin 模型(H-O 模型)：**理論指出一國在其要素稟賦相對充裕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應出口豐富要素稟賦產品、進口要素稀缺的產品，因此具豐富資本的國家傾向出口資本密集型商品，具豐富勞動力的國家則傾向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模型以此觀點解釋各國貿易格局，並引申貿易將影響國內要素收益分配。
 - (2) **Stolper – Samuelson 定理(S-S 定理)：**S-S 定理認為貿易自由化將提升本國豐富要素擁有者的實際收入，同時使稀缺要素擁有者的收入降低；出口部門所使用的要素因國際貿易而受益，而進口競爭部門的要素受害，在此情形下自由貿易將導致收益分配不均，引發部分利

益群體反對自由化。

- (3) **特定要素模型(Sector Model)**：認為生產要素短期內在產業間難以流動，此時同一產業的資本家與工人利益趨於一致，對貿易政策將採取同樣立場，可能發生出口行業與進口競爭行業的利益矛盾，因此貿易政策偏好將按產業劃分而非按要素類別劃分。

4. 利益(Interests)、制度(Institutions)、觀念(Ideas)三個 I 的整合分析：

- (1) **「三個 I」因素**：從利益識別哪些群體在政策中得失及其偏好，由制度了解決策規則如何影響利益表達與決策，以及理念角度關注主導決策者的觀念和信念（例如，自由貿易或保護主義的意識形態），此框架有助於解釋政策形成的原因：誰想要什麼、遊戲規則如何運作、以及思想觀念如何引導行動。
- (2) **三個 I 與三層架構間關係**：在以上三層架構中，結構層往往包含全球性利益與意識形態（如貿易自由化思潮），制度層則是這些理念和利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遊戲規則，而偏好與分配層則反映了具體利益團體在這些制度框架下的行為和觀點。簡言之，國際結構（單一霸權或多極化）形成特定的觀念，進而塑造國際與國內制度，這些制度決定了政策選項的執行方式；同時，各國不同階層的利益在制度框架內爭取有利的政策結果。
- (3) **範例**：冷戰後美國霸權穩固時，自由貿易理念盛行(觀念 Ideas)，因此促成 GATT/WTO 等多邊體系(制度 Institutions)，在此框架下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的利益團體(利益 Interests)積極遊說推動貿易自由化，並影響選民對開放的態度，最終催生了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改革。

二、 全球經濟秩序的創建與演變

(一) 歷史演變

1. **金本位體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9 世紀末到 1914 年國際經濟以金本位制為主，黃金為各國共同的儲備與結算貨幣，主要國家貨幣與黃金掛鉤且可以按固定比價自由兌換黃金，資本可自由的跨國流動，惟由於金本位制嚴重依賴黃金供給且欠缺彈性，因此 1914 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為籌措軍費大量印發紙幣並禁止黃金自由輸出，最終導致古典金本位終結。
2. **兩次大戰間的混亂(1920-1930 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與戰敗國均背負巨額債務與賠款，此期間各國紛紛採取保護主義和貨幣貶值因應經濟困境，1929 年美國股市崩盤引發全球經濟大蕭條，隨著失業激增和社會動盪，1931 年英國率先放棄金本位後多國陸續跟上，最終導致國際貨幣體系瓦解。
3. **布列敦森林體系**：1944 年 7 月 44 國代表在美國布列敦森林會議上達成協議，美元以龐大黃金儲備和經濟實力取代英鎊成為主要儲備與結算貨幣，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重點包括：
 - (1) **固定匯率**：美元與黃金掛鉤，35 美元兌 1 盎司黃金)，各國貨幣固定盯住美元並可向美國央行兌換黃金。
 - (2) **可調整匯率**：允許在出現嚴重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協調調整貨幣平價以免持續失衡。
 - (3) **資本管制與創建 IMF**：各國初期仍實行資本流動管制，以保留貨幣政策空間，同時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短期資金融通，協助成員國應對國際收支困難。
 - (4) **重建與發展機制**：成立世界銀行等機構協助戰後重建和長期發展。此外，美國主導發起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推動貿易自由化。

- (5) **體系的終結**：布列敦森林體系在 1940-1960 年代促進了國際金融穩定和貿易成長，然而隨全球經濟快速擴張，流通的美元供給與美國黃金儲備出現失衡，1971 年美國政府單方面宣布終止美元兌換黃金，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

(二) 學者觀點：戰後國際經濟秩序的理論分析

1. **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描述二戰後至 1970 年代初的國際經濟秩序，主要國家的民眾支持對外經濟自由化政策，政府則提供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和就業政策以確保國內充分就業與社會公平，因此自由國際經濟機制被「嵌入」各國追求福利和穩定的社會規範中，例如布列敦森林體系允許資本管制和 IMF 資助，各國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策自主性來達成就業和增長目標，同時維持國際貿易與貨幣的開放框架。
2. **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主張一個強大的霸權國家是維繫開放穩定國際經濟秩序的關鍵，例如 19 世紀的英國以及二戰後的美國，二者皆提供了當時維持國際體系所需的公共財，有助推動全球經濟更穩定繁榮；然而，當霸權國家衰落或缺位時國際體系的穩定性會出現弱化。
3. **意識形態共識與專家角色**：二戰期間英美兩國政府內出現一批受凱因斯主義啟發的經濟學者與官員，這些專家自由貿易與國內穩定目標之間建立連結，催生出兼顧多邊貿易和國內就業的新體系。
4. **國內利益與政治基礎**：戰後秩序的形成和演變也深受各國國內政治與利益分配的影響，例如美國傾向自由貿易和美元主導，英國則關注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雙方通過談判尋求平衡，反映了英美兩國內部不同經濟部門和利益集團的妥協；另 1970 年代初美國國內政治優先考量

美元利益，放棄固定匯率承諾，直接導致布列敦森林體系解體，顯示國內政治壓力經常是決定國際經濟體系關鍵因素。

三、IMF 與世界銀行的組織運作、規範與影響

(一) IMF 與世界銀行的組織運作與治理架構

1. **成立緣起：**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界銀行均成立於 1944 年布列頓森林會議，IMF 主要監督國際貨幣體系並提供短期資金紓困，維持匯率與金融穩定；世界銀行則專注於長期發展貸款與減貧，主要藉由特定發展項目的融資與技術援助促進經濟發展。
2. **會員與配額制度：**兩機構皆採取會員制並以出資額/經濟規模決定投票權重，IMF 由成員國繳納配額(quota)形成資金池，世界銀行則依股本金額決定投票權，因此經濟大國實際上擁有更大影響力。
3. **理事會與執董會治理：**兩機構理事會由各國財長或央行行長等擔任，日常決策主要由常設執行董事會處理，IMF 的 24 位執行董事中，部分由美國、英國、法國等大國派任，其餘則由多國選舉組成。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則由股東國選出，顯示國家整體實力對國際組織擁有一定影響力，但同時仍會給與國際組織體系一定執行權利。
4. **領導人選任：**IMF 與世界銀行的最高領導歷來由美國即歐洲主導，IMF 總裁傳統上由歐洲人出任，近兩任領導人分別為法國及保加利亞籍，世界銀行行長則自 1946 年以來皆由美國人擔任，此種傳統使美國與西歐在兩機構具有壓倒性地的主導地位，然而在新興國家經濟發展、影響力快速擴大的今天，亦引發新興經濟體對治理公平性的質疑，雖然 2015 年兩組織的改革略微提升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影響力，但仍遠低於美國和歐洲。

(二) 國際組織的爭議：政治干預與美國的影響力

1. **制度設計偏向有影響力的大國：**目前 IMF 與世界銀行的治理結構使少數經濟強國具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如 IMF 的重大事項決議須有總投票權 85%同意才得以通過，而美國約占 IMF 投票權的 16.49%已足以否決重大議案²，因此實質上具有「一票否決」的效果；而世界銀行下屬機構同樣設置重要決議必須有 85%的同意票門檻，美國在世界銀行集團各機構的投票權分別為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為 16.10%、國際開發協會(IDA)為 9.77%、國際金融公司(IFC)為 17.05%、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為 14.81%，因此在某些重大議題上，美國亦掌控「一票否決權」³。
2. **美國對國際組織具龐大影響力：**傳統上世界銀行行長皆由美國提名人選出任，另即便 IMF 總裁由歐洲人擔任，由於美國為其主要股東，因此對總裁選舉仍有實質影響力。美國財政部與 IMF 關係密切，美國政府往往直接參與決策，因此 IMF 常被視為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工具之一。國際上多有質疑兩機構是否過度傾向主要大國，而非全體會員。

(三) 亞洲金融危機與 IMF 附加條件爭議

1. **亞洲金融危機的爭議：**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IMF 對泰國、印尼、韓國等提供了附帶嚴格緊縮與改革條件的紓困貸款，條件包括嚴格控制財政赤字、提高利率、迅速關閉不良金融機構、取消補貼與市場全面開放等，此措施引發強烈質疑，認為經濟衰退時採取緊縮和高利率只會使情況雪上加霜，因此 1998 年 9 月馬來西亞拒絕 IMF 援助，並在自主實施資本管制後快速復甦。亞洲危機後東亞國家對 IMF 越發不信任，2000 年 5 月 6 日 ASEAN+中日韓等國在泰國清邁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中決議擴大貨幣互換協議⁴，以減少對 IMF 的依賴。

² 檢自 IMF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Voting Power <https://www.imf.org/en/About/executive-board/eds-voting-power>(2025/10/7)

³ 檢自 World Bank Group Finance One<https://financesone.worldbank.org/countries/united%20states>

⁴ ASEAN+3 Finance Ministers. (2000, May 6).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f the ASEAN+3 Finance

2. **附加條件與主權爭議：** IMF 貸款附加條件機制(conditionality)飽受爭議，雖然支持者認為 IMF 附加條件是為了確保改革成效，批評者認為侵犯受援助國主權，這些嚴苛措施往往缺乏彈性，很容易加劇經濟與政治的不穩定；此外，強行要求非西方國家執行西方式經濟政策例如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等措施被質疑隱含意識形態偏見和有利於國際投資者(此特指西方國家投資者)，實際上此類「任務擴張」(mission creep)已超過其核心的貨幣金融穩定目標。

四、 WTO、貿易戰與區域主義：國際貿易體系的主要挑戰

(一) WTO 的制度與原則

1. **最惠國待遇原則(MFN)：** WTO 會員在關稅、配額等措施給予任何國家的優惠，都必須無條件地同樣適用於所有其他會員，不可對不同貿易夥伴差別待遇。
2. **國民待遇原則：** 係指外國產品、服務或投資在進入一國市場後，應享有不低於該國本國產品或服務的待遇，各國承諾進口商品進入境內後在稅負、法規標準等方面與本地商品公平競爭。
3. **互惠原則：** 強調貿易讓利的對等性，會員彼此減讓關稅、開放市場時要求權利義務對等，一國享受他國優惠的同時，也須給予對方相同優惠，因此如果一國片面保護自身市場，另一方可採取對等報復措施。
4. **爭端解決機制：** 被稱為「貿易法院」，由專家小組和上訴機構處理會員間貿易爭端，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違規方若不遵守將面臨報復。

(二) WTO 面臨的危機與弱化

1. **上訴機構癱瘓：** 由於美國不滿判決及認定機制有缺陷阻撓新法官任命，2019 年 12 月 11 日，因兩名成員任期於 12 月 10 日屆滿，上訴機

構法官人數已由法定的 7 人減至 1 人(最低需求 3 人)，無法受理新案件使 WTO 上訴機構實際癱瘓，爭端解決機制陷入僵局。⁵

2. **談判停滯與體制僵化：**WTO 自 1995 年成立以來僅完成烏拉圭回合遺留的議題，2001 年杜哈回合因歧見嚴重最終名存實亡，加以缺乏數位經濟、新興服務等新議題相關規則，WTO 日益與現實經貿脫節。
3. **允許濫用國安例外：**近期 WTO 允許成員基於國家安全採取的例外措施出現濫用情況，例如 2018 年美國總統川普以國家安全為由，依據 1962 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對進口鋼鐵、鋁產品加徵關稅⁶，然而實際上美方未能證明鋼鋁關稅屬 GATT 第 XXI 條所稱「戰爭或國際關係緊急情勢」，故不應受國安例外保護，若國安例外成為逃避 WTO 規則的藉口，恐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借國安之名大肆擴張，衝擊多邊體制。
4. **其他挑戰：**美國指責 WTO 對中國等約束力不夠，揚言若改革無果將採取單邊行動。

(三) 區域主義興起

1. **區域貿易協定(RTA)：**係特定國家/地區間實現更高水準貿易自由化的協定，包括自由貿易協定(FTA)、關稅同盟等，協定成員相互給予的貿易優惠可不及於協定之外的其他 WTO 會員，成員間可實行排他性優惠待遇且不被視為對 WTO 規則的違背，代表性協定如 RCEP、CPTPP 等，前者覆蓋面積與人口規模大，後者在原產地累積與數位貿易等設定較高標準。
2. **區域貿易協定影響：**
 - (1) **貿易創造：**協定成員之間取消/降低關稅及壁壘後，成員彼此貿易量

⁵ Miles, T. (2018, January 19). Factbox: Five fundamental threats facing the WTO in 2018. Reuters.

⁶ Trump, D. J. (2018, March 8). Adjusting imports of aluminum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oclamation No. 9704). Federal Register, 83(51), 11619–11624. <https://www.govinfo.gov>; Trump, D. J. (2018, March 8). Adjusting imports of steel into the United States (Proclamation No. 9705). Federal Register, 83(51), 11625–11630.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18-03-15/pdf/2018-05478.pdf>

大幅增加，區內市場規模擴大也有助提高生產效率和吸引投資，進一步強化貿易增長。

- (2) **貿易轉移**：由於成員國彼此相互降稅且對外維持較高關稅，使得部分原本向區外國家購買的商品轉向區內夥伴購買，區域協定的參與者受益，其餘國家則相對處於劣勢。
3. **衝擊多邊主義發展**：由於許多 RTA 涵蓋了 WTO 未及的新議題與更高標準的規則，有助推動更深入的市場開放；然而，大量 RTA 恐使國際貿易規則體系更為碎片化，並且由於 RTA 之間規則不一、相互重疊，將增加企業合規成本。

(四) 美中貿易衝突與制度挑戰

1. **關稅戰**：美中兩國自 2018 年開啟貿易戰，使貿易成本大幅提高，並凸顯 WTO 對大型經濟體缺乏強制力，顯示大國的單邊行動將削弱多邊體制。
2. **技術轉移與智慧財產權爭議**：2018 年美國貿易代表報告認為 WTO 現有規則不足以約束中國的強制技術轉移規定等市場扭曲行為⁷，暴露 WTO 在知識產權與投資領域規範的不足。
3. **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爭議**：由於攸關反傾銷稅計算⁸，中國主張 2016 年後其地位應視同市場經濟體，然而美國、歐盟等認為中國市場干預仍嚴重拒絕承認，反映現行 WTO 規則難以處理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與市場經濟體間的制度差異。
4. **美國對同意中國入 WTO 的反思**⁹：川普政府 2018 年報告指出，2001 年

⁷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March 22).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march/section-301-report-chinas-acts>

⁸ 若被視為「非市場經濟（NME）」，調查機關常用「替代國/顯著扭曲」方法來推算正常價值，容易把成本與正常價值拉高、進而算出較大的傾銷幅度；相對地，市場經濟案件多以企業自身帳冊與本國價格/成本為基礎，較能反映實際成本，所以平均而言稅率傾向較低。

⁹ Donnan, S. (2018, January 19). US says China WTO membership was a mistake.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edb346ec-fd3a-11e7-9b32-d7d59aace167>

支持中國入 WTO 是錯誤決定，因為中國未如預期變為市場導向經濟，WTO 也無法約束中國的扭曲(政府補貼等)行為。

五、 全球政治經濟中的跨國公司

(一) 外國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概念

1. **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係指投資者對另一國的企业進行長期投資並獲得持續性管理控制權的形式。
2. **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在本國之外擁有或控制資產與營運，透過 FDI 在東道國建立子公司、併購當地企業或設立分支機構，利用海外市場的優勢來擴大企業版圖。

(二) **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理論框架(OLI 模型)**：用以解釋企業為何從事對外直接投資，OLI 為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和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對企業而言，只有同時具備這三項優勢時海外直接投資才是最佳選擇。

1. **所有權優勢**：係企業獨有的資源或技術優勢，包括專利、品牌、技術或經濟規模等。
2. **內部化優勢**：指企業透過內部交易取代市場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的能力，若將技術等無形資產在企業內部運用可避免外部市場不確定性，此時企業將更傾向自行投資。
3. **區位優勢**：指東道國相對於企業本國的市場在要素成本、市場規模、資源、基礎設施、政策等方面的優勢，若投資環境明顯有利，企業就有動機將生產活動佈局於東道國。

(三) 東道國與投資者的動態關係：時間不一致性問題

1. **過時協商**(Obsolescing Bargain)：國際投資協議簽訂契約後常因各方利益變化而重新談判，例如一開始東道國為吸引外資往往給予優惠承諾，當跨國公司投入大量固定資產後，撤資成本即變得很高，此時東

道國政府握有更大主導權逆轉原先的權力平衡，東道國政府便有誘因調整原協議以爭取更大利益，即為「過時協商」，例如印尼 2017 年要求外資礦商 Freeport-McMoRan 讓出 Grasberg 銅金礦控股權，經過數月談判，2018 年 12 月印尼以約 38.5 億美元取得 51.23% 股權¹⁰。

2. **外國投資者風險分散措施：**東道國政府在投資落地後改變規則將使企業利益受損，由於 FDI 多為沉沒成本，跨國企業在高風險國家也可選擇引入當地合作夥伴、分散投資或購買政治風險保險等。

(四) 跨國投資者保護：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為保護跨國企業投資以及降低政治風險，許多國家透過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或多邊條約引入投資者－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機制允許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的投資權益受到不當侵害時，直接以東道國政府為被告提出國際仲裁，私人投資者和主權國家在法律地位上被置於相對平等的位置，突破了傳統國際法僅允許國家與國家之間解決爭端的限制。由於多數 BIT/FTA 設計採用 ISDS，允許外國投資者就間接徵收／公平與公正待遇等議題向東道國提起仲裁，同時國與國爭端機制常並存，因此也被視為對東道國主權的一種約束。

六、 中美競爭-新冷戰

(一) 全球經濟失衡的概念與成因

1. **基本概念：**某些國家長期出現巨額經常帳順差與逆差，因此失衡實質上反映了「國內儲蓄－投資缺口」，經常帳赤字必然等於一國儲蓄減去投資的差額，以美中失衡為例，2025 年上半年美國經常帳赤字約

¹⁰ Da Costa, A. B., & Asmarini, W. (2018, December 21). Indonesia closes long-awaited \$3.85 billion Freeport deal.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europe/indonesia-closes-long-awaited-385-billion-freeport-deal-idUSKCN1OK0XT/>

6,911 億美元，而中國上半年經常帳順差則為 2,941 億美元¹¹，是全球失衡的典型例子。

2. **資本流向已開發經濟體：**新興市場的淨儲蓄流向美國等發達金融市場，壓低美國利率、推升風險偏好，例如中國等高順差國將盈餘外匯儲備投入美國國債等資產，壓低美國利率的同時助長信貸泡沫與風險偏好，被一些學者視為 2008 年金融危機的誘因之一。
3. **全球失衡的成因：**
 - (1) 各國宏觀政策與發展戰略差異：美國長期財政與貿易雙赤字反映其高消費，中國等國則採取出口導向和壓低匯率策略以推動高儲蓄投資，累積順差。
 - (2) **金融體系與資本開放：**全球資金自由流動，而金融市場發達的美國吸納過剩儲蓄，加劇了資金單向流動的失衡。
 - (3) **國際貨幣體制不對稱帶來「雙邊依存」：**美元作為儲備貨幣使美國得以長期舉債購買他國商品，中國則透過外匯儲備管理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形成雙邊依存的失衡關係；截至 2025 年 9 月底中國外匯儲備為 3.3387 兆美元，其中 7,307 億美元為美國國債（2025 年 7 月底）¹²。

(二) 中美貿易衝突與政策反應

1. **關稅攻防：**美國前總統川普自 2018 年起對中國大量輸美商品加徵關稅，試圖縮小雙邊貿易逆差，中國則進行等額報復關稅，並集中打擊美國大豆、豬肉等農產品。

¹¹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25, September 23).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2nd quarter 2025 (BEA 25–39). <https://www.bea.gov/news/2025/us-international-transactions-2nd-quarter-2025>;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2025, September 30). *SAFE releases China's balance of payment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and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25*. <https://www.safe.gov.cn/en/2025/0930/2351.html>

¹²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2025, October 7).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t end-September 2025 [Press release]. <https://www.safe.gov.cn/>;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2025, September 18). *Table 5: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July 2025)*.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slt_table5.html

2. 關稅報復措施的政治經濟邏輯

- (1) **中國**：瞄準農產品如大豆，高度政治打擊川普的票倉，對自身經濟代價較高亦在所不惜，反映中美貿易戰不僅是經濟博弈，更是政治博弈¹³。
- (2) **歐盟**：追求對己方傷害最小化的報復組合，較重成本效益。

3. 政策組合

- (1) **美國**：除了關稅還限制中國科技企業(如華為)的市場與技術取得，強調保護國家安全與就業。
- (2) **中國**：除了關稅反制，推出減稅補貼協助受衝擊的本國企業和農民，同時加強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合作以分散對美依賴+減稅補貼+市場多元化與匯率有管理浮動。此外，中國不採取人民幣大幅貶值抵消關稅影響之作法，而是適度管理匯率避免資本外流。

4. 效果評估

- (1) 逆差源於國內儲蓄與投資間的失衡，而雙邊關稅只會轉移貿易來源國而非解決總體逆差，因此美國關稅對縮小貿易逆差無效。
- (2) 中美貿易戰的結果顯示，全球經濟失衡難以透過單邊保護主義糾正。

(三) **民粹主義的需求面與供給面解釋**：近年西方民粹主義崛起，學界從需求面與供給面兩種理論加以解釋：

1. 需求面(Bottom-up)：

- (1) 產業外移、就業流失、薪資停滯、不平等加劇，使部分階層轉而支持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民粹政客以尋求改變。
- (2) 文化反撲：隨著城市中產階級逐漸倡導多元文化、性別平等自由主義價值，年長、低教育程度的白人傳統社群感到價值觀威脅，焦

¹³ Fetzer, T., & Schwarz, C. (2019). Tariffs and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rump's trade war.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7703.

慮驅動他們擁護主張傳統、排外立場的民粹領袖。

2. 供給面(Top-down)

- (1) 政治創業與菁英動員：領袖與政黨以身份、移民、主權等議題塑造敘事並放大不滿。
- (2) 代表體系失靈：全球經濟結構變遷導致部分藍領勞工、中低階層等社群無法在傳統政黨中找到充分代表，社會地位相對剝奪感和社群疏離感孕育民粹政治。

(四) 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政策與戰略角色

1. 金融與匯率

- (1) **巨額外匯儲備**：以美元資產為主支撐匯率與金融穩定，中美兩國形成「超級儲蓄者與超級消費者」的依存關係。
- (2) **匯率制度**：兼顧出口競爭力與資本流動風險控制，如增加黃金儲備、投資一帶一路沿線項目，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外儲多元化與黃金比重上升。

2. 貿易與產業

- (1) **從出口導向轉型內外雙循環**：中國加入 WTO 後，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完善的供應鏈取得製造業競爭優勢，深度嵌入供應鏈。
- (2) **產業升級與技術自主**：產業政策側重進口替代和自主創新，2015 年發布的「中國製造 2025」明確目標是提高高端製造業本地化率、降低對外技術依存，另 2017 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以及「十四五」規劃都強調了關鍵核心技術自立自強。

3. 對外經濟與制度建構

- (1) **中國開始扮演制度建構者的角色**：如 2014 年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簽署成立協定，2015 年簽署章程並於 2016 年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IIB)，填補了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在新興市場基建融資上的缺

口，全球貿易規則方面，參與 RCEP、推出「一帶一路」倡議等，逐漸在部分領域制定了區域規則和標準。

- (2) **爭議與風險**：部分一帶一路計畫所衍生的債務可持續性問題，以及國有企業補貼政策和產能過剩引發他國關切等。

七、金融危機與新興市場

(一) 金融危機類型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常將金融危機分為五種類型，各類型往往可以相互交織並引發更嚴重的連鎖反應：

1. **貨幣危機(Currency Crisis)**：指一國匯率制度遭受投機攻擊而被迫貶值或放棄固定匯率的情況，通常發生在長期國際收支赤字或外匯存底不足國家，貨幣危機往往伴隨嚴重的經濟衰退，並提高銀行危機或主權債務危機發生的可能性。
2. **銀行危機(Banking Crisis)**：金融機構出現擠兌、大量倒閉或需要政府紓困的狀況，通常源於不當的放貸和資產泡沫破裂，導致銀行資不抵債。
3. **債務危機(Debt Crisis)**：又稱主權債務危機，係指一國無法按期償還其政府債或外債導致被迫違約或重組債務的局面，如 1982 年 8 月墨西哥財長宣佈無力償還到期外債，單方面 90 天延緩付息¹⁴，顯示債務違約通常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介入紓困。
4. **通貨膨脹危機(Inflation Crisis)**：為極端通貨膨脹或惡性通膨情況，造成貨幣價值崩潰和經濟失序，通常源於政府過度印製發行鈔票或嚴重的財政失控，如玻利維亞 1985 年惡性通貨膨脹率一度超過 23,000%¹⁵，此類危機最終往往需透過緊縮政策或發行新貨幣來終止通膨螺旋。

¹⁴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n.d.).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of the 1980s.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https://www.federalreservehistory.org/essays/latin-american-debt-crisis>

¹⁵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3, July 17). Reinvigorating growth in Bolivia [Speech by Anoop Singh].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5/09/28/04/53/sp071703>

5. **雙重/三重危機(Twin/Triple Crises)**：以上多種類型同時發生的情況，例如貨幣危機同時引發銀行危機，或再加上債務危機，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印尼及韓國即同時陷入匯率崩盤與銀行體系危機，此類危機往往需要大規模國際援助和全面的經濟改革才能走出困境¹⁶。

(二) 危機的理論解釋：經濟與政治經濟視角

1. **第一代危機模型(經濟基本面失衡)**：強調經濟基本面不相容導致的危機，政府長期財政赤字並以央行外匯儲備支撐固定匯率，最終儲備耗盡引發貶值，適用拉美 1980 年代危機，投資人基於基本面資訊做出理性拋售。
2. **第二代危機模型(自我實現預期)**：引入多重均衡與政策權衡概念，強調政府在固定匯率與經濟目標(如就業)間的取捨可能引發投機者的自我實現預期，如 1992 年英鎊危機¹⁷，英國為維持匯率被迫升息，然而市場質疑政府承受經濟衰退的意願並預期英國終將放棄固定匯率，因此賣出英鎊造成危機，認為市場預期本身可引導政策改變。
3. **第三代危機模型(金融部門與道德風險)**：強調金融部門失衡與貨幣危機的交互作用，銀行和企業過度負債、政府隱性擔保導致道德風險，使得危機一旦爆發將同時侵蝕銀行體系和匯率。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前，很多企業短借長投(**maturity mismatch**)且以美元借債，當貨幣貶值時引發大量破產和銀行擠兌，政府被迫救助銀行加重財政負擔，形成惡性循環¹⁸。

¹⁶ World Bank. (1998/99). Responding to the East Asian crisis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1998/99, Ch. 2). 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GEP/GEArchives/GEP1998-99/310436360_20050012034744.pdf

¹⁷ Bank of England. (n.d.). History.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about/history>

¹⁸ Claessens, S., Djankov, S., & Ferri, G. (1999, January). Corporate distress in East Asia: The effect of currency and interest rate shocks (Note No. 172). World Bank.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77991468759283666/pdf/multi-page.pdf>

4. **資本帳開放與國際資本流動**：從政治經濟視角，新興市場經濟體為吸引外來投資，因此普遍採取資本帳開放和金融自由化，然而經濟繁榮時資本過度流入將導致泡沫，危機時又急速外逃加劇崩盤。
5. **治理失靈與監管不足**：新興市場金融體系往往有結構面缺陷，例如政商關係密切導致金融資源錯配，監管機構受到政治壓力缺乏獨立性，或官員對風險警訊置若罔聞。例如 2000 年 2 月時土耳其因財政失衡、銀行體系外匯部位偏大與監管薄弱，當資本大量外流時隔夜利率一度飆至 2000% 以上¹⁹，因此放棄盯住匯率並導致貨幣大幅貶值、銀行業損失擴大、經濟陷入衰退²⁰。
6. **金融自由化與內部改革**：新興市場在金融自由化進程中，如果內部體制改革滯後，容易誘發危機，比如 1990 年代初墨西哥迅速私有化銀行、解除利率管制和信貸限制後銀行放貸激增，但監管能力跟不上，導致銀行資產品質惡化²¹。
7. **發展偏好與政策扭曲**：許多新興國家的政策制定帶有優先促進發展的偏好，可能導致對風險的低估和政策扭曲，例如一些拉美國家在危機前過度保護匯率和國內利益集團，延後必要的調整（如貶值或財政緊縮），此類政策拖延往往讓最終的危機更具破壞性。
8. **制度因素與危機管理能力**：法治完善、政府公信力高、決策透明的國家更易及早採取預防措施並在危機時迅速應對，而制度薄弱的新興市場在危機來臨時常陷入決策遲滯和政治內耗，錯失控管危機的窗口。例如阿根廷在 1990 年代末因國內政治分歧未能及時調整固定匯率制度，最終導致 2001 年爆發貨幣、銀行、債務三重危機²²。

¹⁹ Republic of Turkey. (2001, May 3). Letter of intent and memorandum on economic polic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loi/2001/tur/02/>

²⁰ Turkey: Financial crises in context. (2001, March 13).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Report No. RS20842).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reports/RS20842.html>

²¹ Krueger, A. O. (1999). Mexico (NBER Working Paper No. 704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s://www.nber.org/papers/w7042>

²²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of the IMF. (2004, July 26). The IMF and Argentina, 1991–2001

(三) 新興市場國家的共通特徵與脆弱性：

1. **外債與貨幣錯配**：新興國家為促進發展常大量舉借美元等外幣計價的外債，資產卻以本幣計價，一旦本幣大幅貶值，債務負擔將急劇膨脹導致資不抵債。
2. **固定匯率與匯率高估**：不少新興國家採用固定或釘住匯率以抑制通膨或穩定預期，一旦投資人懷疑當局維持匯率的決心或能力，就可能發動攻擊迫使匯率崩盤。例如巴西在 1990 年代中期實行固定匯率造成實質匯率偏高，亞洲危機後因投資人質疑而最終放棄固定匯率，實質有效匯率全年約貶值 35%²³。
3. **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動**：資本帳自由化讓新興市場在景氣好時能夠吸引大量外來投資，但這些資金往往**短期逐利且高度波動**。當國際環境或市場情緒轉變時，資金可能快速撤出，引發金融動盪。
4. **金融體系脆弱與監管不足**：新興市場的銀行與金融市場往往欠缺完善監管和風險管理，因此許多國家在危機前會出現信貸熱潮與資產泡沫，一旦環境惡化，銀行體系容易陷入危機。
5. **通膨歷史與政策可信度**：不少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可信度較低，政府有時採用固定匯率或發行高息債券吸引資金穩定匯率，一旦投資人對政策穩定性失去信心可能迅速撤資，引發匯率暴跌和物價進一步飆升的惡性循環。
6. **政治不穩定與治理問題**：新興市場國家常面臨政治體制不穩、腐敗或政策執行不連貫的問題，政治動盪可能成為危機的導火線，例如 2001 年的土耳其，在銀行體系問題和龐大財政赤字情況下，當執政聯盟內

(Evaluation Report).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ieo/2004/arg/eng/pdf/report.pdf>

²³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 of the IMF. (2003, March 8). Brazil (Background paper in The IMF and recent capital account crises, Annex on Brazi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ieo/2003/cac/pdf/bra.pdf>

部爆發衝突後外資信心驟降，外資在 2000 - 2001 年間合計撤出逾 700 億美元²⁴，直接引發匯率崩潰和經濟深度衰退。

八、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一) 貨幣政策傳遞管道

1. **核心目標與工具**：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經濟成長與就業、金融穩定；工具則以政策利率為主，必要時搭配非常規工具如量化寬鬆(QE)、前瞻指引、負利率、信用與流動性措施等。
2. **利率管道(Interest Rate Channel)**
 - (1) **降息**：降低融資成本、減少儲蓄誘因，以擴張信貸、支出與投資並提振總需求。
 - (2) **升息**：當需求過旺導致通脹升高時，央行提高利率以抑制過熱支出，升息將提高借貸成本，使家庭減少對房屋和汽車等耐用品的購買、企業縮減資本支出。
 - (3) 政策利率與商業利率非一對一連動，但方向大致一致。
3. **資產價格管道(Asset Price/Wealth Channel)**：降息推升資產估值提高家庭財富，並鼓勵借貸與消費。
4. **匯率管道(Exchange-Rate Channel)**
 - (1) **相對他國降息**：降低本幣資產吸引力使本幣貶值，導致進口更貴而出口更具價格競爭力，以推升通膨與產出。
 - (2) **相對他國升息**：較高利率吸引國際資金推動本幣升值，削弱出口競爭力從而抑制淨出口，使通膨與產出走低。
5. **預期管道(Expectations Channel)**：央行政策會影響民眾對通膨的預期，若央行表明將持續緊縮以控制物價，民眾對預期未來通膨下降，將使

²⁴ American Diplomacy. (2024, February 1). CPR for the Turkish economy: The 2001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https://americandiplomacy.web.unc.edu/2024/02/cpr-for-the-turkish-economy-the-2001-financial-crisis-and-its-aftermath/>

企業投資、薪資議價與定價以及家庭儲蓄與消費決策偏向保守，將有助壓低實際通膨。

(二) 貨幣政治與中央銀行獨立性(CBI)

1. **央行需要獨立性：**中央銀行獨立性高係指央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能不受短期政治壓力干預專注長期經濟目標。

(1) **時間不一致性：**若貨幣政策受制於政治，政府決策者可能先承諾低通脹以穩定預期，但事後為追求短期景氣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最終導致通膨升高。

(2) **承諾技術：**賦予央行適當的獨立性有助於維持政策連貫性，IMF 研究發現，一國的央行獨立性高則往往有較低且穩定的通脹率²⁵。

2. 全球趨勢與區域差異

(1) **1990 年代後全球強化 CBI 浪潮：**20 世紀 90 年代起北美、歐洲等許多國家陸續立法強化央行法定獨立地位²⁶，其他地區則相對落後。

(2) **近年 CBI 遭削弱：**近年來，各別國家出現了削弱央行自主性的逆轉情況，如土耳其曾強行壓低利率最終引發匯率崩跌和惡性通貨膨脹的教訓²⁷，即便是美國，政府領袖也可能公開施壓央行改變政策方向。

(三) 金融危機與 COVID 之後的政策新方向

1. 傳統工具傳導失靈與非常規工具崛起

(1) 2008 年危機期，由於銀行間不信任、風險溢價飆升，使得傳統利率渠道失靈。

²⁵ Mathai, K. (n.d.). Monetary policy: Stabilizing prices and output. Finance & Development — Back to Basic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Series/Back-to-Basics/Monetary-Policy>

²⁶ Garriga, A. C. (n.d.). CBI data. Ana Carolina Garriga. Retrieved October 7, 2025, fro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arogarriga/cbi-data-1>

²⁷ Kucukgocmen, A., Devranoglu, N., & Toksabay, E. (2023, July 27). *Turkish central bank more than doubles 2023 inflation forecast to 58%*.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turkish-central-bank-raises-year-end-inflation-forecast-58-2023-07-27/>

- (2) 主要央行長期維持「更低、更久」的利率(Lower for Longer)，甚至實施負利率。
 - (3) **量化寬鬆(QE)**：央行買入政府公債和其他資產以壓低長期利率並增加市場流動性，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改變資產組合結構。
2. **疫情衝擊下的擴表與擴權**：在 COVID-19 衝擊期間，多國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政策工具與介入領域同步擴大，央行並於二級市場執行做市功能、提供信用融通支持，並透過購買主權債與公司債等非常規措施，於壓抑風險溢價、維繫市場功能與穩定宏觀金融條件方面發揮關鍵作用。²⁸
3. **副作用與風險**
- (1) **等同對儲戶課稅**：低利率壓縮存款人、退休者與保險業收益，迫使民眾提高儲蓄以達到同樣財務目標。
 - (2) **資產價格扭曲與不平等**：超寬鬆推升股房市估值，財富效果對持有資產的人更有利，導致所得/財富不平等問題，例如瑞典房價攀升後採取信用管制抑制，最終額外的負擔較由年輕、資產較少者承擔²⁹。
 - (3) **改革遭延遲**：低利率使推動金融結構改革的政治壓力降低，可能拖累長期生產力成長。
 - (4) **納稅人風險上升**：在非戰時情境下資產負債表大幅擴張與長期超低利率，提高了央行潛在損益對公共部門的外溢風險，一旦利率重定價或資產價值下修，央行的損失與利息付支壓力可能透過盈虧分配、上繳機制變動或資本補強需求等，轉化為財政部門與納稅人之潛在負擔。

²⁸ Cavallino, P., & De Fiore, F. (2020). *Central bank policies and the pandemic: A (somewhat) airy overview*.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²⁹ Andersson, F. N. G., & Jonung, L. (2020). Lessons from the Swedish experience with negative central bank rates. Lun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20:15. https://portal.research.lu.se/files/194582727/WP20_15.pdf

九、國際關鍵貨幣：美元、歐元與人民幣

(一) 貨幣的功能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架構

1. **貨幣三大功能：**貨幣在經濟中扮演價值儲存、交換媒介和計價單位等三種核心功能。而在國際上，全球通用的關鍵貨幣亦必須有能力承擔這三大功能，例如美元長期以來充當各國政府和私人部門的國際交易媒介、計價單位與價值儲存工具。
2. **國際貨幣體系架構：**國際貨幣體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MS)係指跨國支付的規則與制度安排，例如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將美元與黃金掛鉤，1971 年該體系解體後由美元取代黃金成為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交易價值儲藏工具。

(二) 貨幣霸權與美元特權

1. **美元貨幣霸權與經濟特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元一直是全球貨幣之首，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近六成(2024 年約 58%，2025 年 Q2 約 57.7%)³⁰，美元霸權地位賦予美國可持續舉債和發行貨幣之權利，而無需擔心對外償付能力，因此美國通過發行全球通用的美元獲取鑄幣稅收益，並能以低成本融資，並享有交易便利和避險利益；因此，美元霸權提供了美國巨大的金融靈活性和持續赤字融通的空間。
2. **政治基礎與權力工具：**美元特權根植於美國的政治實力和制度信任，美國龐大的經濟規模、開放且深厚的金融市場和健全的法律體系，強化全球對美元資產的信心。因此美元的獨特地位讓美國政府獲額外的權力工具，美國可藉由金融制裁等手段懲罰違反國際秩序者。但此舉也促使部分國家加速尋求金融體系多元化，以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如以本幣結算貿易等)。

³⁰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5, October 1). Dollar's share of reserves held steady in second quarter when adjusted for FX moves [IMF Blog]. <https://www.imf.org/en/Blogs/Articles/2025/10/01/dollars-share-of-reserves-held-steady-in-second-quarter-when-adjusted-for-fx-moves>

(三) 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³¹與美元武器化

1. **特里芬難題**：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為滿足世界日益增長的儲備需求，美國長期對外提供美元流動性，但往往伴隨經常帳赤字和債務累積，美國若不提供足夠的儲備資產，全球可能出現通縮傾向，但若提供過多又會導致美國對外債務堆積至不可持續，最終侵蝕對美元的信心。因此儲備貨幣發行國難以同時維持國內穩定與供應全球流動性的平衡，該問題在當前美元本位體系下仍以新形式存在。
2. **美元的武器化**：美元逐漸成為美國對外地緣政治博弈的利器，美國可限制特定國家使用美元及相關支付網絡，以達施加經濟壓力之目標，例如，伊朗與俄羅斯曾因美國制裁被排除在美元結算體系之外³²，對其國際貿易和金融造成沉重打擊，凸顯了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然而，美元武器化也帶來長遠隱憂：一些國家因擔心受制於美元，開始尋求替代管道，促進去美元化和建立獨立於美國的支付系統等努力。

(四) 歐元的挑戰與制度侷限

1. **第二大市場**：歐元區經濟規模和金融市場僅次於美國，使歐元成為繼美元之後的第二大國際貨幣，依據 SWIFT 最新國際清算(跨境支付)統計³³，截至 2025 年 9 月前 6 名貨幣分別為美元(46.94%)、歐元(25.61%)、英鎊(6.76%)、日圓(3.37%)、加元(2.96%)及人民幣 2.93%。

³¹ 由已故著名經濟學家特里芬 (Robert Triffin) 1960 年代提出，在他的著作《黃金與美元危機》(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書中指出，布列敦森林制度不可持續，其或有助於緩解全球貨幣準備的短缺，但唯有當主要通貨發行國提供充足通貨，方能達成此一功能；然而，若主要通貨發行國源源不絕地提供流動性，必將造成自身國際收支逆差惡化，終將因其他國家對主要通貨作為安全資產的信心漸失，使得該制度逐漸邁向崩潰

³² 伊朗在 2012 年 3 月 15 日因歐盟決議被 SWIFT 指示切斷受制裁銀行的訊息服務，另 2018 年 11 月 SWIFT 再次暫停部分伊朗銀行連線，同時 OFAC 的伊朗制裁使美元清算與與美方金融往來大幅受限，實質上把伊朗排除在美元結算體系之外。美國財政部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對多家主要俄銀實施封鎖與融資限制，嚴格限制其以美元交易；2022 年 3 月 12 日歐盟決議 SWIFT 斷接七家俄羅斯銀行，使其跨境結算與對外貿易金融受重大干擾。

³³ SWIFT. (2025, September). *RMB tracker: Monthly reporting and statistics on renminbi (RMB) progress towards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ugust 2025 data). <https://www.swift.com/swift-resource/252486/download>

2. **歐元發展限制：**歐元區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與共同債券，成員國政府債務市場彼此分割，欠缺如美國國債般集中而安全的儲備資產；此外，歐洲央行決策須協調多國，反應速度較慢，因此國際角色發展受到多重制度侷限，難以撼動美元的主導地位制約。

(五) 人民幣的潛力、限制與國際化策略

1. **人民幣崛起背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目前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貿易國，中國政府自 2009 年起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包括允許以人民幣進行跨境貿易結算、設立離岸人民幣市場(如香港 CNH)、與多國央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以及推動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籃子特別提款權等，目標是降低對美元依賴和提升國際金融影響力。
2. **人民幣國際化的限制：**
 - (1) **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中國資本帳戶尚未完全開放，嚴格的資本管制限制境外投資人持有和使用人民幣資產。
 - (2) **經常帳長期順差：**並由於中國經濟結構長期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成長，在國內需求不足下經常項目長期順差，意味中國對世界輸出資金但未輸入相應需求，人民幣在全球流通的規模因此受限³⁴。
 - (3) **國內阻力：**中國須增加進口、減少順差、將購買力輸出國，才有可能擴大人民幣國際流通，然而此種轉型將恐受到國內既得利益團體的阻力，研究指出³⁵，目前中國還無法承擔成為全球主導貨幣所需的經濟讓步和內部調整成本，短期內人民幣頂多有機會成為亞洲區域性強勢貨幣。

(六) 主要貨幣比較與貨幣多極化

³⁴ 由於經常帳長期順差對應資本淨輸出，而對外收支多以外幣資產承接、且資本帳管理較嚴，境外可獲得並循環運用之人民幣存量受限；在缺乏足量高流動性人民幣資產與廣泛結算場景的情況下，人民幣之國際流通與使用規模因而受到結構性約束。

³⁵ Germain, R., & Schwartz, H. M. (201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RMB.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3(4), 765–787.

1. **現況比較：**美元目前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依然居於首要地位，在全球儲備、貿易計價和金融交易中佔據主導地位，其次歐元為第二大國際貨幣，然在外匯儲備、國際支付及投資占比仍低於美元，人民幣屬新興國際貨幣，雖影響力快速提升但占比仍小，無論在儲備還是交易中的比重都明顯落後於美元和歐元。

排名	官方外匯儲備占比 ³⁶	跨境支付占比 ³⁷ (含歐元區內部)	跨境支付占比 (排除歐元區內部)
1	美元 (USD) 56.32%	美元 (USD) 46.94%	美元 (USD) 54.83%
2	歐元 (EUR) 21.13%	歐元 (EUR) 25.61%	歐元 (EUR) 20.37%
3	日圓 (JPY) 5 - 6%	英鎊 (GBP) 6.76%	英鎊 (GBP) 5.05%
4	英鎊 (GBP) ~4 - 5%	日圓 (JPY) 3.37%	日圓 (JPY) 4.55%
5	人民幣 (CNY) 略高於 2%	加幣 (CAD) 2.96%	加幣 (CAD) 2.49%
6	澳幣 (AUD) 略高於 2%	人民幣 (CNY) 2.93%	人民幣 (CNY) 2.01%

2. 多極化的可能趨勢：

- (1) **美元地位仍穩固：**目前尚無雙極或多極的貨幣格局之明確跡象，美元霸權依舊穩固，美元市場規模龐大且流動性充裕，換用其他貨幣的誘因仍很低。
- (2) **有限貨幣多元化：**美元的占比可能緩步下降，但全球占比維持最高，歐元和人民幣則在某些區域和特定領域扮演更重要角色，即便美國相對優勢下降，美元的既有優勢使其主導地位難以撼動。

十、 歐盟、英國脫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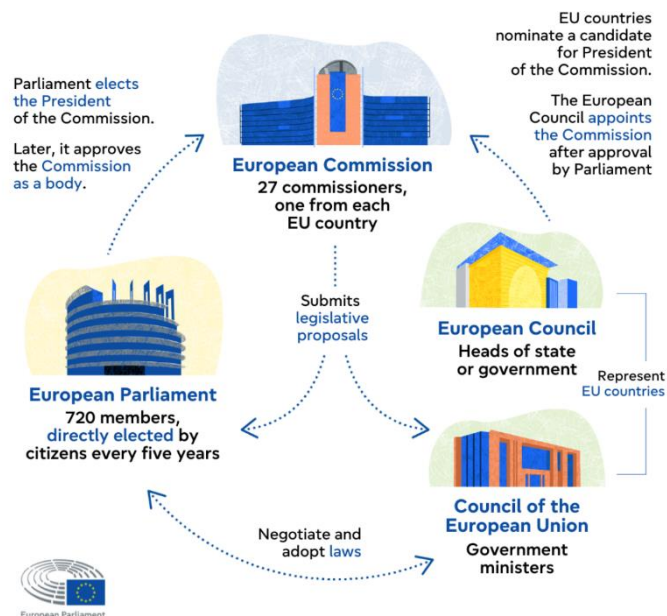
- (一) **歐洲統合的歷史與制度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促進和平與重建經濟，歐洲國家開始推動區域統合。**歐洲整合**歷經數個重要階段與里程碑：

³⁶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d.).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OFER). <https://data.imf.org/en/datasets/IMF.STA:COFER>

³⁷ SWIFT. (2025, September). RMB Tracker (August 2025 data). <https://www.swift.com/>

1. 1951 年由法、德、義、荷、比、盧六國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
2. 1957 年簽署《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EC），邁向關稅同盟和共同市場。
3. 1973 年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英國加入後仍對部分統合持保留。
4. 1986 年簽署《單一歐洲法案》，加速實現商品、勞務、資金和人員的歐洲單一市場(1992 年完成)。
5. 1992 年簽署《馬斯垂克條約》正式創立歐洲聯盟(EU)，規劃經濟暨貨幣聯盟(EMU)和統一貨幣，成員國需遵守財政紀律，包括赤字不超過 GDP 的 3%、債務不超過 GDP 的 60%等。
6. 1999 年歐元正式啟用，目前歐元區包含 20 國。

(二) **歐盟的制度架構**：歐盟由歐洲委員會、歐洲理事會、歐洲議會等組成，兼具超國家和國家間合作特色，其中歐盟委員會負責政策提案與執行，理事會和議會共同立法。成員國將部分主權讓渡給歐盟機構，以換取決策共同體與規則型國際秩序的利益。



資料來源：歐洲議會官方主題頁「What do the EU institutions do? (infographic)」。

(三) **歐盟統合制度缺失**：歐盟的經濟統合速度快，但政治與財政統合相對薄弱，雖然歐洲央行統一決定貨幣政策，但各國卻維持獨立的財政政策且缺乏中央財政轉移機制，此種結構在遇到經濟危機時暴露風險，希臘在2009 – 2015 年間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因無法以貶值吸收衝擊，最終仰賴多輪經濟調整計畫與救助貸款³⁸，但其國內卻承受嚴厲緊縮與深度衰退，凸顯歐盟的制度風險。

(四) 英國脫歐的原因與政治經濟意義

1. **主權與民主訴求**：英國民眾認為歐盟對英國內政和法律有過多干預，脫歐支持者強調恢復國家主權、由英國議會自行制定法律的重要性。
2. **經濟不滿與不平等**：英國部分傳統工業區受全球化與產業外移衝擊而沒落，許多藍領和小城鎮居民感到被主流政治與精英忽視；經濟上的「留下者多為受惠於全球化的大城市專業人士，而「被落下者」則多為傳統產業工人、中低收入者，兩方形成明顯對立。
3. **移民焦慮**：歐盟東擴後大量東歐移民湧入，部分英國人擔心就業和社會福利被侵占。
4. **媒體與政治宣傳**：英國一些小報長年持疑歐論調，醜化歐盟形象，2016 年公投前出現不實或誇大的宣傳，另有民粹政客強調平民聲音對抗菁英，使脫歐看似是對「體制」的不信任投票。
5. **英國脫歐的政治經濟意義**：
 - (1) **政治上意義**：脫歐代表區域統合可能出現逆轉，顯示歐盟並非不可逆的單行道，也給其他成員國的疑歐勢力打了一劑強心針。
 - (2) **歐盟支持度上升**：由於英國脫歐的過程充滿混亂並付出高昂代價，歐盟其他國家的民眾反而在公投後對歐盟支持度上升，沒有出現連鎖退出的骨牌效應。

³⁸ 歐元區與其救助機構（EFSF/ESM）與 IMF 合計對希臘放款約 2,887 億歐元（其中 EFSF/ESM 約 2,037 億歐元），以避免違約與金融傳染。

- (3) **英國社會撕裂**：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多數選民支持留歐，英格蘭和威爾斯多數支持脫歐，導致英國國內統一面臨挑戰。
- (4) **經濟成本增加**：脫歐後英國失去單一市場與關稅同盟的無障礙進出口條件，服務業喪失通行證資格，英國預算責任署研究顯示³⁹，預期 2031 年英歐貿易合作協議將使英國長期生產力下降約 4%，意即長期 GDP 較留歐情境小約 4%；同時英國進口水準長期各低約 15%。
- (5) **歐盟影響力下降**：短期內歐盟貿易的影響較小，長期下因少了一個重要的經濟體和淨預算供款國⁴⁰，地緣政治影響力有所削弱。

(五) 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浪潮與歐盟內部挑戰

- 1. **歐洲民粹興起**：近年金融危機、緊縮政策以及全球化造成的社會撕裂等，導致歐洲民粹主義政潮興起，民粹主義者主張精英與庶民對立，強調捍衛人民對抗建制體制與跨國權威，歐洲主要國家民粹主義者越來越活躍，包括：
 - (1) **法國**：國民陣線候選人以反移民、反歐盟議題進入總統大選決選。
 - (2) **義大利**：長期經濟停滯和難民潮引發強烈反建制情緒，2018 年民粹政黨五星運動和極右聯盟黨組成執政聯盟，公開與歐盟預算規則對抗。
 - (3) **德國**：德國另類選擇黨崛起，批評歐元救助與移民政策，在東德地區成為主要反對勢力，在聯邦議院擁有席次。
 - (4) **東歐**：包括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匈牙利的青民盟等右派民粹執政者，在司法獨立、媒體自由等問題上挑戰布魯塞爾權威。
- 2. **歐盟內部重大挑戰**：民粹勢力高漲與反全球化浪潮密不可分，由於全球化不只帶來經濟機會，也造成產業外移、所得分配不均和文化衝擊，歐

³⁹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2025, July 30). Brexit analysis (updated with March 2025 EFO). <https://obr.uk/forecasts-in-depth/the-economy-forecast/brexit-analysis/>

⁴⁰ 歐盟用「營運預算收支（Operating Budgetary Balance, OBB）」衡量，若一國向 EU 預算繳納的金額減去該國從 EU 預算獲得的分配，若繳納大於分配，該國就是淨預算供款國。

洲民粹政治人物因此主張反對自由貿易協定、要求嚴格管理邊境拒絕難民和移民、鼓吹經濟民族主義等，直接衝擊歐盟奉行的開放市場和自由流動原則。

十一、 COVID-19 與全球政治經濟

(一) 疫情對全球貿易與供應鏈的衝擊

1. **全球貿易斷崖式下跌與反彈**：COVID-19 大流行初期，各國封鎖措施導致 2020 年全球商品貿易萎縮約 5.3%，隨著主要經濟體重啟與需求回升，2021 年全球貿易量強勁反彈約 8%⁴¹。
2. **貿易復甦並不均衡**：東亞等出口導向地區率先恢復，而依賴旅遊等服務貿易的國家持續低迷，凸顯經濟結構差異對復甦速度的影響。
3. **供應鏈中斷**：封城期間跨境運輸受阻，許多製造業面臨零部件斷供困境，如汽車和電子產業曾因關鍵零件短缺而被迫減產、航運樞紐港口出現壅塞、運費飆漲更加劇了供應鏈瓶頸。另疫情初期醫療防護物資全球告急，突顯供應鏈過度集中單一來源的脆弱性。
4. **供應鏈結構調整**：各國和跨國企業開始尋求供應鏈多元化與在地生產，以提高關鍵物資供應的韌性，使全球化轉向「區域化」或「在地化」。

(二) 各國政策回應：財政與貨幣刺激

1. **史無前例的財政刺激方案**：依據 IMF 統計⁴²，截至 2020 年底全球各國合計推出約 11.7 兆美元的財政措施，相當於全球 GDP 的近 12%。
 - (1) **美國**：美國 2020 - 2021 年累計「上帳」⁴³財政措施約為 GDP 的 25.5%，內容涵蓋現金補助、失業保險擴充、企業紓困與醫療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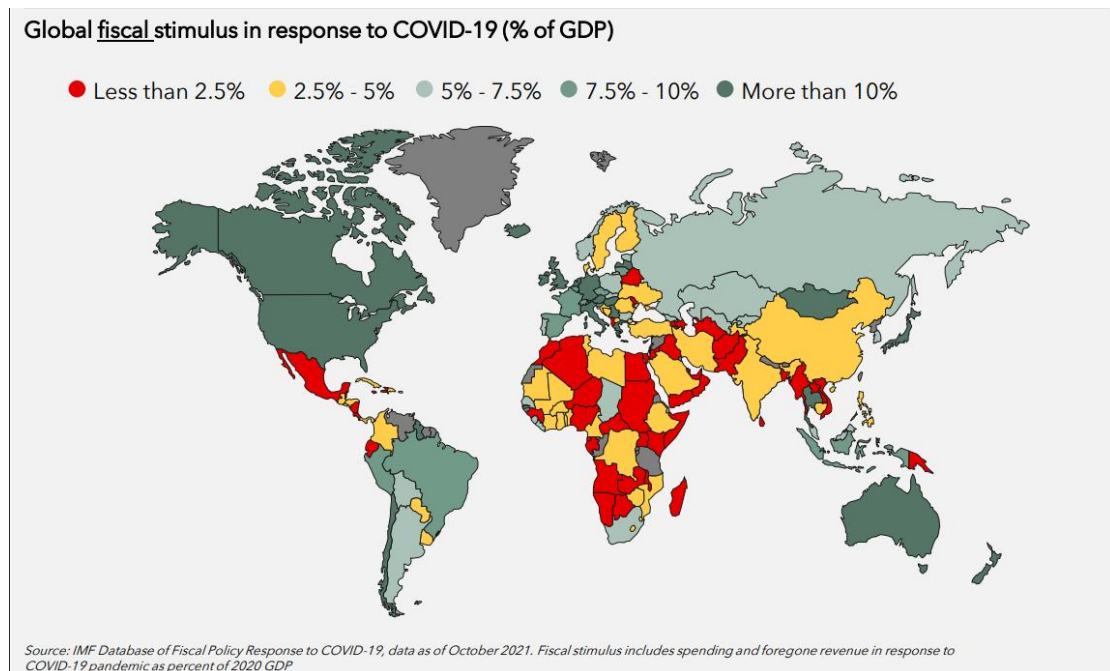
⁴¹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1, March 31). World trade primed for strong but uneven recovery after COVID-19 pandemic downturn (Press Release No. 88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⁴²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0b). Fiscal Monitor, October 2020: Policies for the Recovery. Washington, DC: IMF.

⁴³ 上帳」(above-the-line) 定義為直接影響政府本年度赤字的措施，會「進入帳面」計入歲出或減少歲入者，常見項目包括政府現金支出、醫療、防疫採購、疫苗、薪資補貼、紓困金、失業給付、弱勢補助等；以及暫時或永久的稅負減免、如營業稅減免、所得稅退稅等。

等。

- (2) **歐盟機構層級**：歐盟機構層級本身的「上帳」措施約為 GDP 的 3.8%，多為成員國的支出提供融資與共同舉債，並設置 7,500 億歐元的歐洲復甦基金。
- (3) **歐盟成員國**：多數大型成員國 2020-2021 年「上帳」支出大致在兩位數百分比範圍，包括工資補貼、企業固定成本補貼、減稅與醫療支出等。
- (4) **中國**：2020-2021 年累計「上帳」財政措施約為 GDP 的 4.8%，另搭配稅費減免、社保緩繳及以政策性金融、地方政府專項債推動投資等工具。
- (5) **其他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由於財力有限，上帳措施多數落在約 2 - 6% 的 GDP 占比。



資料來源：MUFG. (2021, November). Over \$30 trillion of global monetary & fiscal stimulus。

2. **積極的貨幣寬鬆政策**：各國中央銀行同步祭出超常規的貨幣寬鬆政策，防止金融危機與信用緊縮。

- (1) **美聯儲**：2020 年 3 月迅速將利率降至零，同時啟動大規模量化寬鬆

和緊急貸款工具，穩定金融市場信心⁴⁴。

- (2) **歐洲中央銀行**：啟動「緊急抗疫購債計畫」(PEPP)⁴⁵，規模達 1.85 兆歐元，用以壓低歐元區各國公債利差。
 - (3) 多國央行也採取降息、資產購買與提供美元流動性互換等協調行動。
 - (4) 寬鬆的貨幣環境亦降低了各國政府融資成本，為大規模財政支出提供了支撐；然卻造成資產價格飆升，股市與房市在疫情中後期屢創新高。
3. **公共債務攀升**：大規模財政刺激伴隨經濟產出下滑，導致各國公共債務佔 GDP 比率急劇攀升，IMF 估計⁴⁶2020 年全球公共債務水準達到空前的 97%，並預計 2021 年約 99%，其中先進經濟體平均已達約 123%⁴⁷。新興市場與低收入國家債務雖相對較低，但亦面臨債務累積和償債壓力。

(三) 全球經濟復甦的不均衡性

1. 國家間復甦差距：

- (1) **中國**：在嚴格防疫下經濟在 2020 年第二季反彈，全年實現正成長。
- (2) **美國**：憑巨額財政與貨幣刺激政策，2021 年中 GDP 實際產出回到疫情前水準。
- (3) **歐元區與日本**：直至 2022 年才逐步接近疫前水準。
- (4) **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受限於疫苗取得不易、觀光業低迷及財政餘力不足，復甦落後於已開發國家。

⁴⁴ Federal Reserve. (2020, March 15). 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pressreleases/monetary20200315a.htm>

⁴⁵ European Central Bank. (n.d.). Pandemic emergency purchase programme (PEPP). <https://www.ecb.europa.eu/mopo/implement/pepp/html/index.en.html>

⁴⁶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 April). Fiscal Monitor: A Fair Shot. Washington, DC: IMF.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fiscal-monitor/2021/April/English/text.ashx>

⁴⁷ Kose, M. A., Nagle, P., Ohnsorge, F., & Sugawara, N. (2021). What Has Been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Debt? Turning a Wave into a Tsunami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80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801991638297695658/pdf/What-Has-Been-the-Impact-of-COVID-19-on-Debt-Turning-a-Wave-into-a-Tsunami.pdf>

2. **疫苗獲取與復甦掛鉤：**截至 2021 年底，美英等國已為超過 70%的人口接種兩劑疫苗，歐盟平均接種率亦逾六成。然而低收入國家同期完整接種率卻不到 5%，疫苗分配不平等直接影響抗疫效果和經濟重啟進程。
3. **疫苗外交：**如歐盟和印度在 2021 年上半年為穩定供應一度收緊疫苗出口，美中俄等國則透過捐贈或優惠提供疫苗爭取地緣政治影響力。
4. **產業與社會復甦不均衡：**
 - (1) **產業面：**科技和數位經濟受益，電子商務、大型科技企業在疫情期間業績飆升，而傳統服務業如旅遊、航空、餐飲等遭重創
 - (2) **勞動面：**各國普遍出現低技能勞工和弱勢群體受創較深現象⁴⁸，2020 年 4 月美國失業率曾飆升至 14.7%⁴⁹。另許多臨時失業人口退出勞動力市場或工時減少，導致所得兩極化和貧困人口回升。
 - (3) **貧困人口增加：**世銀估計⁵⁰2020 年新增約 7,000 萬人陷入極端貧困，為 1990 年以來最大單年增幅，並使全球減貧進展出現二十年來的重大逆轉。

肆、心得與建議

本次進修課程節奏密集緊湊，課程規劃三周內讓學員學完一整學期的內容，因此需於極短時間內閱讀與消化大量資料，常常在尚未完全吸收上一節授課內容時，又進入下一個主題，並且搭配許多課外閱讀文章，學習強度極高，截至目前尚不敢自許已能全面融會貫通所有核心知識；然而，隨著課堂中各類知識的積累，以及返國後撰寫報告時重新消化相關知識，原本較為抽象之理論已逐步與現實相互印證。前述章節已將課程內容大致歸納統整，涵蓋理論基礎、實務案例及多項重要且即時的議題，以下僅就當前全球政經環境之變化、

⁴⁸ OECD. (2021). 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21: Navigating the COVID-19 Crisis and Recovery.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787/1c7f0a09-en>

⁴⁹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0, May 8).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 April 2020 (News Release USDL-20-0815).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it_05082020.htm

⁵⁰ World Bank. (2022).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 Correcting Cour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s://doi.org/10.1596/978-1-4648-1893-6>

臺灣於其中扮演之角色，試以國際政治經濟學觀點予以綜合分析，並提出若干思考與建議。

一、 全球政經變局

(一) 貿易戰與全球供應鏈重組

2018 年美中貿易摩擦由最開始的關稅戰，慢慢演變為包括科技管制、投資審查、出口管制的科技戰，此後管制範圍更擴散至半導體、AI、關鍵材料等戰略領域，期間雙方互課關稅及各類報復性手段頻出，在現實主義視角下這場衝突凸顯了「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的考量，即美國擔憂中國從全球貿易中獲取的利益相對自身更大，因而採取承受經濟代價以遏制中國崛起之作法，顯見各國關注相對權力增長而非絕對收益。除了貿易戰對全球供應鏈產生顯著重組效應，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造成的生產混亂及中斷，讓許多跨國企業開始調整生產佈局，以降低對單一國家的依賴，並導致經貿環境變化：

1. **貿易轉移(trade diversion)效應**：部分美國企業將製造鏈從中國轉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地，同時臺商因應客戶移動，亦配合將供應鏈遷回臺灣或分散至東南亞，在這個趨勢下 2024 年臺灣對美出口成長 46.1%創歷年最大增幅，但對中國與香港外銷年減 1.1%，並且連 3 年衰退，為有統計以來首見，顯示在全球經貿板塊變化下，貿易轉移正在發生。
2. **供應鏈重組與區域性貿易轉移**：美中科技戰的直接影響是推動了「中國+1／友岸外包」與區域化的供應鏈重組，IMF 指出⁵¹，全球貨物貿易占 GDP 比率在金融危機後變化有限，但其結構性改變已出現端倪，貿易與投資正依據價值與安全同盟重組，主要國家提高關鍵產業部門的貿易壁壘、擴大出口管制、強化對外投資審查，以及推動友岸外包等，此一現象直接印證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區域主義的分析，貿易戰發生後區域出現新的內部供應鏈與貿易創造。

⁵¹ Gopinath, G., Gourinchas, P.-O., Presbitero, A. F., & Topalova, P. (2024). Changing Global Linkages: A New Cold War? IMF Working Paper 2024/076

(二) 跨國企業對國際供應鏈的影響

在全球政經變局中跨國企業(MNC)與各國政府的關係複雜又緊密，跨國企業的投資與供應鏈決策往往深受政府政策及壓力影響，但也可能反過來影響國家戰略及產業政策，近年美國政府與全球主要半導體製造業者台積電的互動即是最典型案例。

1. **國家力量影響供應鏈移轉：**臺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扮演關鍵角色，美國政府為降低風險及確保晶片安全，推出《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ct）提供巨額補貼鼓勵晶片製造回流，臺灣的主要晶片製造商在壓力下自 2020 年起在亞利桑那投資興建先進晶圓廠，並持續追加投資擴張在美產能，顯示國家影響力能直接影響跨國企業的投資決策，當國家安全、外交與經濟效益最大化出現衝突時，供應鏈會被迫進行調整。
2. **跨國企業對政府政策影響：**各國正在以更廣義的「國家安全」要求介入產業結構重塑，同時推出吸引企業投資的工具，包括補貼、政府採購、制定標準、研發合作、稅務優惠等；OECD 發現全球工業補貼規模在 2023 年升至金融海嘯以來新高⁵²，顯示各國皆積極吸引跨國企業投資，例如日本以巨額補助吸引先進製造回流，並成功吸引臺灣半導體廠商於熊本設廠，另印度 PLI（生產連結獎勵）計畫對 14 項關鍵產業依照銷售給予相應的現金回饋，務求以法規和財政誘因快速擴大本土製造業規模，反映出大型跨國企業帶動產業發展及就業機會的能力，推動政府政策進行改變。

二、臺灣面臨的挑戰

⁵²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5, June 23). The state of play of industrial subsidies as of 2023 [Policy brief].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the-state-of-play-of-industrial-subsidies-as-of-2023_753cd39f-en.html

臺灣經濟高度依賴對外出口，面對當前國際結構改變的趨勢極易受到影響，在大國角力、供應鏈重組的情境下，臺灣的產業將面臨極大挑戰：

(一) 供應鏈調整對臺灣產業的衝擊

1. **廠商面臨供應鏈調整壓力：**國際經貿變局導致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出口連年下滑，2024 年對中港出口額比三年前倒退約 4 年水準，雖然部分出口轉向美國和東協，但中國仍占臺灣出口三成以上，若中美兩國對抗態勢加劇，原本臺廠設在大陸的生產據點可能因無法直接出口美國而停產，既有投資恐面臨產能閒置甚至資產損失。
2. **廠商可能失去未來商機：**美國以安全為由要求盟友配合其對中國的科技封鎖，臺灣主要晶圓代工科技廠商被迫放棄部分中國高階製程訂單，可能影響短期營收；同時，美國本土半導體生產鏈的擴張將削弱臺灣在全球晶片供應中的優勢地位，加以供應鏈「去中化」趨勢使得過去臺商在中國大陸所建設的產業聚落可能被打散或放棄，部分廠商需要重新建立上下游生產鏈，短期內將對營運或造成負擔。

(二) 區域經貿整合趨勢下臺灣處境

1. **區域經貿整合蔚為趨勢：**過去幾年區域經貿整合蓬勃發展，臺灣周邊出現多個多邊貿易協定，包括 2022 年全面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其涵蓋中、日、韓、東協、澳紐等國約 22 億人口，並且占全球 GDP 和貿易量的近三分之一，為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另「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則為納入日、加、澳、英等 12 國之高標準、全面性、高自由化程度和與時俱進的高品質貿易協議，成員多為先進經濟體，會探討包括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控制事業、勞工、環境、法規調和、透明化和反貪腐等許多超過 WTO 規範的議題，成員國 GDP 合計占全球 15%。近

期更有歐盟－印度自由貿易協定(EU - India FTA)、歐盟－南方共同市場協定(EU-Mercosur Partnership Agreement 與 interim Trade Agreement, iTA)，以及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升級版 3.0 (CAFTA 3.0)等，顯示區域經貿持續整合之大趨勢。

2. **臺灣經貿邊緣化處境：**即便臺灣的產業鏈高度整合進全球經貿體系，由於未能參與上述任何協定，當區域貿易協定成員國間相互降低關稅和非關稅貿易障礙之後，將直接削弱臺灣產品出口的價格競爭力，例如 RCEP 成員彼此關稅減讓後，日本及韓國的產品在東協市場享有比臺灣更優惠待遇，恐使臺灣廠商失去訂單。另一方面 CPTPP 成員國間也將形成更緊密的供應鏈關係，臺灣雖擁有高科技優勢，卻可能受限於關稅門檻和原產地規則而錯失商機，而若臺廠轉向這些成員國家投資設廠，又可能導致臺灣本地供應鏈空心化、失去就業機會等打擊。

(三) 臺海情勢恐影響產業對臺灣的投資決策

1. **供應鏈恐繞過臺灣：**美中除了經濟面競爭，軍事上的對抗亦引發國際對臺海局勢的憂慮，可能使跨國公司做投資決策時對臺灣持觀望態度，以避免讓供應鏈過度暴露在臺海的潛在風險。臺灣雖因美中競爭在短期獲利，且近期因 AI 與高階製程需求高科技廠商營業額出現爆發式成長，但長期若區域緊張升高，新投資的邊際選址可能更多流向東南亞、墨西哥與中東歐地區，此種供應鏈繞過臺灣的現象不利經濟安全，並且可能讓台灣逐漸被排斥在區域供應鏈體系之外。
2. **對臺投資直接減少：**由於國際上對臺海局勢的憂慮，企業對臺投資信心受到影響，部分代工廠商被外國客戶要求將一定比例產能設於臺灣以外(如越南、馬來西亞、墨西哥、捷克/波蘭或愛爾蘭等)以分散風險，此舉雖可提升整體供應鏈韌性，卻加重廠商資本支出與管理成本且分散了臺灣本土的附加價值，無形中減少臺灣產業的發展和就業機會。

三、 政策建議

(一) 強化供應鏈韌性，推動創新升級

1. **建立關鍵產業供應鏈：**臺灣在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擁有龐大優勢，政府可透過公共投資與政策誘因，鼓勵關鍵零組件在國內生產，對半導體、資通訊、醫療、生技等關鍵產業，或考慮在稅賦、融資和用地方面給予相應的激勵，吸引臺灣廠商將部分關鍵生產環節遷回國內，確保台灣的產業優勢地位。同時臺灣產業可抓住美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機會，在供應鏈變化的過程持續加深與美、日產業合作，以在全球供應鏈板塊重塑時不被落下。
2. **培育跨領域高階人才：**產業快速演進與技術更迭的過程中，擁有足夠的人才才是產業轉型的關鍵，然而臺灣的人才培育與供給正面臨嚴峻挑戰，愈來愈多優秀人才赴海外工作或深造，加劇本土產業升級的難度。建議政府可由政策面結合跨部會資源，協助大學與技職院校課程設計與產業接軌，同時鼓勵企業主動提升員工技能，共同培養產業需要的複合型人才，如具備 AI 程式設計又懂醫學的複合背景，或了解材料科學又懂商業開發者，以推動產業升級。另在人才培養階段的短期缺口，可藉由積極吸引國際尖端人才，或邀請海外臺灣人才回國服務短期或遠距貢獻，以補足產業人力需求。
3. **提升中小企業創新能力：**依據經濟部《2024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臺灣的中小企業家數占全體企業 98%以上，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近 8 成(逾 916 萬 7 千人)，中小企業的存續直接關係到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是臺灣經濟最重要的根基，因此協助中小企業數位轉型與升級至關重要。政府可結合 ICT 龍頭企業及學研單位力量，協助傳統產業導入電子商務、智慧生產等系統，同時在轉型期提供專案貸款、補貼等政策工具，以協助

減輕降低中小企業升級負擔等，並讓中小企業搭上全球工業 4.0 與數位經濟浪潮，成功完成升級轉型。

(二) 積極參與區域架構，深化供應鏈合作

1. **爭取加入 CPTPP 等區域經貿協定：**CPTPP 為高標準、全面性的區域貿易協定，其成員國更占臺灣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包括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皆為臺灣的前十大貿易夥伴。政府可藉由成立談判團隊進行遊說與溝通，透過雙邊管道向現有成員強調臺灣的對區域供應鏈的貢獻與價值，同時預先盤點 CPTPP 各類規範與要求，提前推動相關法規調整，使智慧財產權保護、勞工權益、國營企業競爭中立等條件符合其規範，俟時機成熟後或有機會在最短時間內完成談判並履行加入協定程序。
2. **加強臺美經貿關係：**臺灣可善用臺美 21 世紀貿易倡議的平台，爭取涵蓋更多議題與更實質的市場開放，並持續推動數位貿易、科技、醫藥品及醫材監管合作等議題，使雙方關係更加緊密。同時，政府可利用目前全球供應鏈變局的機會，深化臺美科技合作架構，確保臺灣在美國的科技供應鏈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提升臺灣的經貿談判地位及籌碼。
3. **深化與歐盟及其成員國的經貿合作：**臺灣與歐洲近年產業合作越發緊密，臺灣半導體業目前是歐洲各國爭相競爭的對象，歐洲的綠能技術則被引入臺灣能源產業，因此政府或可藉由邀請歐洲企業來臺投資離岸風電等專案，以及臺灣企業赴歐設廠半導體並接受歐洲資金支持等，加深與歐洲經濟聯繫並形成利益共同體。後續政府可推動更多經貿代表團互訪，並積極洽簽有關雙重課稅、專利審查高速公路等實用性協議，降低雙邊企業往來成本，以協助臺灣廠商全球布局。
4. **深化新南向政策與南亞合作：**過去臺灣長期深耕新南向國家，在全球供應鏈板塊移動的窗口期，或可思考將政策重點由過去的出口轉向投資互

惠，例如鼓勵臺商赴東協、南亞等地投資設廠，同時邀請當地國家的企業來臺合作、合資，甚至共同開發第三地市場，將雙邊的經貿關係向上提升。此外，隨著台商觸角在東南亞地區延伸，培育廠商需求的人才刻不容緩，或是可以提供更多獎學金與培訓給東協南亞菁英，為政府及企業培養長遠經貿人脈。

四、 結語

本人承蒙長官肯定，獲得參與本會「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出國短期進修實施計畫」機會，得以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修習國際政治經濟學相關課程，本次赴英國進修國際政治經濟學之後，對歐美國際政治領域的思維加深理解，逐漸替過去的純經濟思維加入新的觀點。後全球化時代全球發展趨勢由「經濟效率極大化」轉向「國家安全與韌性並重」，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這是「相對利益」與「經濟國家主義」的回潮。站在臺灣的立場，接下來將同時面對中美大國競爭擠壓、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投資轉向、貿易轉向及供應鏈版塊移動等危機，但同時也有機會抓住友岸外包、區域供應鏈與在地化之機會。面對當前世界變局，臺灣的最佳策略不是被動等待回流，而是努力突破當前人才及轉型的瓶頸，提升智慧財產、勞工權益等法律保障，同時對外更積極參與區域貿易協定，強化與美國、歐洲及新南向國家經濟聯繫，在對外拓展的同時，讓臺灣仍能保有關鍵的研發、設計、先進製程等，以堅強的經濟實力提升實質地位。

參考文獻

1.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9).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Foreign exchange turnover in April 2019. Basel: BIS.
<https://www.bis.org/statistics/rpfx19.htm>
2. Baschuk, B. (2018, April 11). The five biggest threats to the WTO. Bloomberg New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11/five-big-threats-to-the-global-trade-cop-trump-deems-unfair>
3. Bodea, C., & Higashijima, M. (2017).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fiscal policy: Can the central bank restrain deficit spend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 47 – 70. <https://doi.org/10.1017/S0007123415000672>
4. 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 Khandelwal, A. K. (2020).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1), 1 – 55.
5. Farrell, H., & Newman, A. L. (2019).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1), 42 – 79.
6. Garriga, A. C. (2025).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Dataset (Version 3).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https://datafinder.qog.gu.se/dataset/cbi>
7. Garriga, A. C. (2025). Revisiting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in the world: An extended datase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9(2), sqaf024.
<https://doi.org/10.1093/isq/sqaf024>
8. Germain, R., & Schwartz, H. M. (201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rrency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RMB.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3(4), 765 – 787.
9. Gidron, N., & Hall, P. A. (2020). Populism as a problem of social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7), 1027 – 1059.
10. Greenspan, A. (1996, December 5). The challenge of central banking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Speech].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1. Guetta-Jeanrenaud, L., Poitiers, N., & Veugelers, R. (2021, July 20). A world divided: Global vaccine trade and production. Bruegel. <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world-divided-global-vaccine-trade-and-production>
12. Heckscher, E. (1991).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H. Flam & M. J. Flanders (Eds.), *Heckscher-Ohlin trade theory* (pp. 43 – 69). MIT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1919 essay)
13. Herrera, H., Ordoñez, G., Konradt, M., & Trebesch, C. (2020). Corona politics: The cost of mismanaging pandemics (PIER Working Paper No. 20-033).
<https://doi.org/10.2139/ssrn.3690490>
14. Ikenberry, G. J.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 Ikenberry, G. J. (2011).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 Inglehart, R., & Norris, P. (2017).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16-026, rev.). Harvard Kennedy School.

<https://www.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trump-brexit-and-rise-populism-economic-have-nots-and-cultural-backlash>

1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0b). Fiscal Monitor, October 2020: Policies for the Recovery. Washington, DC: IMF.
1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21: Recovery During a Pandemic. Washington, DC: IMF.
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5, April 16). Investors seek safe haven assets following geopolitical risk events (IMFBlog, summarizing WEO April 2025, Chapter 2). Washington, DC: IMF.
20. Kaminsky, G. L., Reinhart, C. M., & Végh, C. A. (2005). When it rains, it pours: Procyclical capital flow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M. Gertler & K. Rogoff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4* (Vol. 19, pp. 11 – 8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1. Kindleberger, C. P.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2), 242 – 254.
22. Laeven, L., & Valencia, F. (2013).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database. *IMF Economic Review*, 61(2), 225 – 270. <https://doi.org/10.1057/imfer.2013.12>
23. Li, Q. (2009).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expropri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8), 1098 – 1127.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09331723>.
24. Mateos y Lago, I., Duttagupta, R., & Goyal, R. (2009). The debate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SPN/09/26).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5. Oatley, T. H. (2018).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6th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51034661>
26. Ohlin, B. (1933).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7. Otero-Iglesias, M., & Steinberg, F. (2013). Is the dollar the hegemonic currency? Insights from the perceptions of financial eli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3), 679 – 714.
28. Ravenhill, J. (Ed.). (2011).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3r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 Schularick, M., & Taylor, A. M. (2012). Credit booms gone bust: Monetary policy, leverage cycles, and financial crises, 1870 – 200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2), 1029 – 1061. <https://doi.org/10.1257/aer.102.2.1029>
30. Simmons, B. A. (2014). Bargaining over BITs, arbitrating awards: The regime for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orld Politics*, 66(1), 12 – 46. <https://doi.org/10.1017/S0043887113000312>.
31. Stiglitz, J.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32. Stolper, W. F., & Samuelson, P. A.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 58 – 73.

33. Tovar, C. E., & Mohd Nor, T. (2018). Reserve currency blocs: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MF Working Paper 18/20).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34. Weaver, C. (2007). The world' s bank and the bank' s world.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3(4), 493 – 512.
35. Wellhausen, R. L. (2015). Investor – state disputes: When can governments break contra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9(2), 239 – 261.
36. Windsor, C., & Halperin, D. (2018, September).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Where to next? *RBA Bulletin*. Sydney: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https://www.rba.gov.au/publications/bulletin/2018/sep/rmb-internationalisation-where-to-next.html>
37.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21, March 31). World trade primed for strong but uneven recovery after COVID-19 pandemic downturn (Press Release No. 88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1_e/pr876_e.htm
38. Zhou, X.(周小川). (2009, March 23). 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Beijing: People' s Bank of China.